

藏学

8

ZANG XUE
YAN JIU
LUN CONG

研究 论丛

西藏人民出版社

5

新平知藏

PDG

8
藏学研究论丛

ZANG XUE

YAN JIU

LUN CONG

藏学研究论丛

第八辑

※

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藏人民出版社微机室排版

成都锦祝印务所印装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 字数:200 千字

1996年11月 第一版 1996年11月 第一次印刷

印数:2500

ISBN7—223—00959—4

Z·57 定价:10 元

新平
和
PDG

97
K297.5
1
2:8

《藏学研究论丛》编委会

主任 拉巴平措
顾问 恰贝·次旦平措
委员 常凤玄 姚兆麟 陈庆英(北京)
李延恺 谢 佐(青海)
唐景福 洲 塔(甘肃)
李绍明 李学琴(四川)
张天锁 (陕西)
何宗英 杨志国(西藏)



C

431064

目 录

浅析吴忠信是主持十四世达赖喇嘛认定坐床 专使,还是观礼贵宾	李鹏年(1)
浅析北洋政府维护西藏主权的措施及其得失	陈玮(17)
1943年《艾登机密备忘录》的形成和影响	胡岩(40)
九世班禅返藏问题与英国的阻挠活动	唐洪波(59)
热振寺、热振活佛与热振事件述略	范亚平(75)
西藏晚期村落共同体形态初探	刘忠(86)
扎什伦布寺强巴佛像的塑造和美学意义	安旭(110)
从两件满文档案看西藏宗教领袖的朝贡	喜饶尼玛(119)
伊斯兰化的小西藏(巴尔蒂斯坦)民间文化考察	杨恩洪(125)
西藏文化地理简论	朱普选(149)
藏族文化的摇篮——寺院	共确降措(165)
甘孜寺历史简述	晋美桑珠(204)
五世达赖喇嘛年谱(1654—1662)	陈庆英(221)
关于《四部医典》的版本及流传情况	本考(259)
藏学研究论文摘编	张松操(266)
编者话	(281)

浅析吴忠信是主持十四世达赖喇嘛认定坐床专使，还是观礼贵宾

李鹏年

关于国民政府特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入藏主持十四世达赖喇嘛认定坐床问题，在西藏近代史研究中，几十年来一直存在不同意见之间的争论，长期未能取得共识，得出正确结论。

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不仅否认 1949 年以前他与国民政府“没有任何关系”，而且矢口否认 1940 年吴忠信受国民党中央政府委派在拉萨布达拉宫主持其坐床典礼是“没有这回事”，仅是“在场观礼”。^① 达赖集团也散布“十四世达赖的寻访，没有经过国民党政府的批准”，“国民党政府代表吴忠信，只是作为仪式上的贵宾，没有什么特别作用”等谰言。^②

笔者因工作关系，近年来接触了大量有关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寻访、认定和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方面的第一手资料——国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官方文书档案。现就史料所及，对吴忠信究竟是国民政府特派主持十四世达赖喇嘛认定坐床专使，还是观礼贵宾问题，作一粗浅分析，以求匡正视听，澄清史实，还历史本来的真实面貌。

① 1988 年 6 月 28 日台湾《中国时报》。

② 1995 年 7 月 3 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一、达赖喇嘛转世坐床的历史定制

达赖喇嘛转世之制，创于黄教创始人宗喀巴。以呼毕勒罕转生，世代承袭。呼毕勒罕的寻访和选定，初以达赖喇嘛圆寂前的预示、乃迥降神、观察海蜃、辨认用物、考察灵异特征等宗教形式和仪轨来进行。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建立金瓶掣签制度以后，除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寻访仍按上述宗教仪轨进行寻选外，达赖喇嘛呼毕勒罕的最后认定，必须经过掣签确认，并奏报皇帝谕准才为有效。

举行掣签时，由驻藏大臣会同班禅额尔德尼主持掣签仪式。由驻藏帮办大臣将写有灵童姓名的名签放入金瓶，由驻藏办事大臣亲自启瓶抽签。^①

如果寻得的灵童特别灵异，全藏僧俗公认为达赖转世化身，须呈请驻藏大臣转奏皇帝特准，免于掣签。

有清一代，按照上述历史定制寻访和确认的达赖喇嘛转世灵童是：七世达赖喇嘛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由康熙皇帝册封；八世达赖喇嘛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由乾隆帝委派章嘉呼图克图认定为前辈达赖喇嘛转世灵童；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建立金瓶掣签制度后，十世、十一世、十二世达赖喇嘛均系经过金瓶掣签拈定，九世和十三世达赖喇嘛则是分别奉嘉庆皇帝和光绪皇帝特旨，免于掣签认定的。

达赖喇嘛转世灵童认定后，要选择吉日举行坐床典礼，以示正式承继达赖喇嘛之位。

达赖喇嘛坐床典礼，例由驻藏大臣前往照料(亦称看视、抚视)。在坐床典礼上，驻藏大臣的坐位例有定制：达赖喇嘛居中正坐，驻藏大臣于达赖喇嘛西首，俱一字平列面南而坐，惟达赖喇嘛

^① 《西藏宗教源流考》：“金巴瓶掣签之上谕”和“掣签典礼”。

系高座，驻藏大臣坐褥较达赖喇嘛略低。不仅坐床典礼仪节如此，就是平时驻藏大臣前往布达拉宫会见达赖喇嘛时，其相见仪注亦是这样，历代相沿，成为定制。^①

二、吴忠信受国民政府特派入藏主持 十四世达赖喇嘛认定坐床

1933年12月17日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国民政府便面临寻选和认定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和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问题。1938年藏历七月，西藏摄政热振和噶厦打电报给西藏驻重庆办事处，指示速赴国民政府请求尽快将青海寻获之转世灵童护送入藏认定。并声称：转世灵童“须经护法神和活佛的核验认定方能坐床”。^② 国民政府显然认为转世灵童“须经护法神和活佛的核验认定”不符旧例和历史定制。为此，国民政府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九月制定和颁布了《喇嘛转世办法》，共十三条，其中明确规定：达赖喇嘛圆寂，其转世灵童寻获后，必须“转报蒙藏委员会查核”，然后咨行驻藏办事长官主持“公同掣签”，“掣签仪注，依照向来惯例办理”；达赖喇嘛呼毕勒罕掣定后，必须“报请蒙藏委员会查核转呈”国民政府“备案”；举行坐床典礼时，必须“由该地方最高行政机关呈请中央特派大员前往照料坐床”。^③ 国民党政府参考前例，斟酌现情，制定喇嘛转世办法，意在坚持按历史定制办理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寻访、认定和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问题，从而维护“中央对藏固有之权”，并认为这是“抚驭西藏之要道，自不容有所

① 《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以下简称《汇编》）第5册，2221页，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版。

② 西藏自治区档案馆藏：噶厦为迎请青海达赖灵童事致西藏驻重庆办事处电稿。

③ 《十三世达赖圆寂致祭和十四世达赖转世坐床档案选编》（以下简称《选编》）第141页，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年版。

放弃”。^①

随后，蒙藏委员会又于10月8日根据《喇嘛转世办法》的规定，就十四世达赖喇嘛掣签认定事宜，拟定了三种办法：

“（一）国民政府特派大员前往拉萨，会同热振呼图克图主持第十四辈达赖喇嘛掣签事宜。

“（二）国民政府特派大员会同热振呼图克图主持第十四辈达赖喇嘛掣签事宜，并得由该员指派代表就近办理之。

“（三）国民政府特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会同热振呼图克图主持第十四辈达赖喇嘛掣签事宜，并得由该委员长指派代表就近办理之。”

这三种办法，“虽于维护体制之中隐寓权变之意”，但“皆以达到中央实施对藏固有之达赖转世掣签权为主旨”。^②经国民政府核准，决定按第三种办法办理。

1938年12月12日，热振致电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表示：达赖喇嘛转世三灵童迎到拉萨后，应掣签认定，“举行掣签典礼之际，为昭大信，悦遐迩计，中央应当派员参加。”^③

12月18日，西藏驻京办事处致吴忠信代电称：转奉噶厦指令，对蒙藏委员会拟定的达赖喇嘛转世掣签认定办法中的第三项，表示“诚恳接受”。^④

1938年12月28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特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会同热振呼图克图主持十四辈达赖喇嘛转世事宜。”^⑤

1939年4月21日，西藏驻京代表阿旺桑丹等亲赴蒙藏委员会拜见吴忠信，23日又致书面代电，转达噶厦对吴忠信亲莅拉萨

① 《选编》第145页。

② 《选编》第146页。

③ 《选编》第158页。

④ 《选编》第160页。

⑤ 《选编》第166页。

主持十四世达赖喇嘛认定坐床“极表欢迎”。^①

1939年8月4日，吴忠信向行政院呈送了关于入藏任务、人员组织及所需经费等问题的报告。

关于赴藏任务，报告中提出：“此行任务为主持达赖转世，而附及册封热振、授勋司伦噶厦。”“其精神可括以‘树立信用’、‘收拾人心’两语。”并主张中央政府应借此机会“重新调整与藏之关系，以增进大中华民族之团结”，“一面应昭示公诚，以坚其信，一面应妥为宣慰，以安其心。尤要者，政府在可能范围内为之解除困难，予以便利，同时晓以五族一家及国家至上之大义，俾了然于中央之宽大为怀及民族之休戚与共，庶乎情感既和，祚虞尽释，而后新的关系始可以次建立。”

关于人员组织，报告中提出组成“委员长行辕”，并拟定了《蒙藏委员会委员长行辕组织规程》，设立必要的办事机构，调配得力的工作人员，以资“意见不致复杂，步骤可期一致，方足得边人信仰，而完成所负任务。”

关于所需经费，报告提出“应对其僧俗官民多予赏赉，对其寺庙团体广予布施”，欲要“树立中央在藏之新的基础，和洽各方，尤非有大量之款万难集事。”由于此事“乃西藏人心之所系及中央德意之所关”，吴忠信强调“无论财政如何困难，亦不能不勉力从事，”^②

报告得到行政院批准。并在批复文件中强调指出：“西藏为我国领土，屏藩西陲，关系至巨。”“对外固应联络感情，避免磨擦，惟有关主权之事，亦未便曲为迁就。对内必须化以公诚，树立信义，……使其知我中央一秉大公，无偏无党，对于边区人民一视同仁，不分畛域。”^③

① 《选编》第188页。

② 《选编》第219—223页。

③ 《选编》第265页。

1939年10月1日,吴忠信在重庆组成“蒙藏委员会委员长行辕”,并启用由国民政府颁发的铜质“蒙藏委员会委员长行辕关防”,开始办公,积极筹备入藏事宜。

1939年10月21日,吴忠信率行辕人员一行由重庆启程赴西藏。途经香港、仰光、加尔各答、大吉岭、噶伦堡、冈多、亚东、江孜等地,于1940年1月15日抵达拉萨。

从上述档册斑斑的历史事实看,吴忠信是受国民政府特派入藏主持十四世达赖喇嘛认定坐床的中央政府代表和专使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认为吴忠信仅是“在场观礼”贵宾的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三、十四世达赖喇嘛呼毕勒罕是经吴忠信 察看后呈报国民政府批准认定的

吴忠信到拉萨后,发现转世灵童发生了变化。原先热振和噶厦向中央报告说共寻获三人(西藏两名,青海一名),现只有青海灵童一人。西藏当局不仅未把在西藏寻得的两名灵童的来去情况向吴忠信交代清楚,热振反而提出,“青海灵童灵异卓著,全藏僧俗公认为第十三辈达赖化身,经民众大会决议,不再举行掣签,拟请中央援照第十三辈达赖先例,准予免除掣签手续。”吴忠信当即表示:“此事须呈请中央核定,本人只能负责转呈,不能即作决定。”热振一再派员向吴忠信申述免予掣签之事,吴忠信则以“灵儿转世,关系西藏政教前途至钜,不容草率”而给予拒绝。后经双方官员一再磋商,议定免予掣签必须有两个前提条件:1. 由吴忠信亲自“察看灵童是否确属灵异”;2. “由热振正式具文呈请中央,免除抽签手

续”。^① 热振接受了这两个条件。

根据议定条件，热振于 1940 年 1 月 26 日致函吴忠信，请求转呈中央政府批准青海灵童为十四世达赖喇嘛，免于掣签。来函在详细叙述了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情况，为寻访灵童乃迥降神、卜卦所示情形，热振观看湖幻所见情形，以及灵童寻访过程和灵异表现之后称：青海灵童拉木登珠，“西藏僧俗大众，贵贱大小，皆中心诚信，认为十三辈转世之真身。因群众情投意合，不须掣瓶，照例剃发受戒，业已呈报中央在案。兹遵乃冲大神所示，庚辰年坐床为吉，谨选定正月十四日举行坐床典礼。其应如何转报中央之处，即请代达为荷。”^②

吴忠信接热振函呈后，原打算立即察看灵童，俟当面察看后，再将热振报告及其本人对灵童察看情况一并转呈中央。但因察看灵童形式问题有待与西藏当局商讨，不能即刻进行察看，吴忠信遂于次日（即 27 日）向行政院院长蒋介石发出“感电”。转报了热振报告。

1 月 29 日，吴忠信派行辕秘书朱少逸、华寄天偕通事张旺赴罗布林卡，拜访顾嘉总堪布，商洽察看灵童事宜。不料遭到顾嘉无理拒绝，双方发生争执。后在吴忠信的干预和坚持下，热振派员到行辕道歉，并请吴忠信指定察看时间和地点。吴忠信遂定于 1 月 31 日在罗布林卡荷亭内察看。是日上午十一时左右，吴忠信率随员至罗布林卡，与灵童谈了话，合影留念，并赠送福州漆佛一尊、藏银五千两、黄缎一匹、座表一只等四件礼品。察看时，灵童由顾嘉总堪布陪侍。吴忠信察看之后对灵童的印象是：“灵儿年仅四岁有半，姑无论其灵迹所在，传遍遐迩，即其起坐行动之间，稳重幽闲，虽成人犹不可及，亦异事也。”^③

① 朱少逸：《拉萨见闻记》。

② 《选编》第 286—287 页。

③ 朱少逸：《拉萨见闻记》。

根据吴忠信感电报告, 行政院长蒋介石于 1940 年 1 月 31 日向国民政府呈请明令批准拉木登珠继任为十四世达赖喇嘛并发给坐床典礼经费。呈称: “案据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拉萨感电称: 据西藏摄政热振呼图克图来函略称, 第十三辈达赖喇嘛转世一案, 迭经观海、降神及僧俗官员公认, 青海觅得之灵童拉木登珠种种灵异, 实系第十三辈达赖喇嘛化身, 应请免予抽签, ……请转呈中央核夺。等情。忠信复查所述灵异各节, 均属确实, 拟请转呈国民政府颁布明令, 特准以该灵童拉木登珠继任第十四辈达赖喇嘛, 并发给坐床大典经费四十万元, 以示优异。等情。据此, 当经提出本院第四五〇次会议, 决议: 通过, 转呈国民政府颁发明令。”^①

2 月 5 日, 国民政府发布命令:

“青海灵童拉木登珠, 慧性湛深, 灵异特著, 查系第十三辈达赖喇嘛转世, 应即免予抽签, 特准继任为第十四辈达赖喇嘛。此令。

“拉木登珠业经明令特准继任为第十四辈达赖喇嘛, 其坐床大典所需经费, 着由行政院转饬财政部拨发四十万元, 以示优异。此令。”^②

1940 年 2 月 17 日, 西藏摄政热振对中央政府特准拉木登珠免予掣签继任十四世达赖喇嘛, 并拨发坐床典礼经费, 特电国民政府主席林森, 表示“叩谢”。^③

从上述档册凿凿的历史事实, 可以无可辩驳的得出结论: 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是经吴忠信亲自察看, 并由吴忠信报请行政院转呈国民政府明令特准免予掣签认定为十四世达赖喇嘛呼毕勒罕和正式继任为十四世达赖喇嘛的。这充分表明, 吴忠信是国民政府特派代表, 中央政府特使, 行使了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应有的权力。因此, 达赖喇嘛和达赖集团采取不认帐的态度和视而不见的手

① 《选编》第 289 页。

② 《选编》第 290 页。

③ 《选编》第 298 页。

法,散布 1949 年以前与国民党政府“没有任何关系”,“十四世达赖的寻访,没有经过国民政府批准”等谰言,毫无道理,在事实面前不攻自破。

四、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是在 吴忠信主持下举行的

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于 1940 年 2 月 22 日(藏历正月十四日)在拉萨布达拉宫举行。吴忠信率行辕全体官员出席了坐床典礼,并会同热振摄政主持了坐床大典,受到了与清代驻藏大臣相同规格的待遇。

在坐床典礼举行之前,关于典礼的仪节,事先吴忠信曾派员与热振洽商,双方同意照西藏旧例办理。但是,有关吴忠信的座位问题,双方发生了分歧。西藏当局最初拟把吴忠信的座位安置于热振对面,坐垫高低则与司伦等同。吴忠信对此安排拒绝接受。吴认为本人代表中央政府主持达赖喇嘛坐床事宜,又系主管蒙藏事务长官,“体制攸关,不便迁就”,主张“至少应照清代驻藏大臣之例设座,即于达赖平行之左方设面南之座”。几经磋商,西藏当局最后答应“遵办”。^①

吴忠信认为,“其于中央主权最有关系者,则为座位问题。……座位问题既定,其他琐琐者均无关宏旨。”^②于是,坐床典礼遂按旧例及宗教仪式举行。坐床时,吴忠信坐于“达赖左方,地位面南,与之平行,适如旧制,坐垫高约三尺。”热振坐于“达赖右方面西,司伦

^① 朱少逸:《拉萨见闻记》。

^② 《黄慕松吴忠信赵守钰戴传贤奉使办理藏事报告书》(以下简称《报告书》)第 149 页,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 年版。

与热振平坐，惟垫较低。”行辕职员坐于吴忠信左前方，共分三排，“前排垫高与噶伦等”。尼泊尔、不丹代表坐于“行辕职员之下，亦面西，垫仅一层。”噶伦、扎萨尔、台吉等“坐殿之南部西北”，四品以下僧官“坐活佛背后”，僧官“坐噶伦背后”，总堪布和各堪布“分立达赖身旁”。^①

由于坐床典礼是按旧例和宗教仪式举行的，所以在典礼上没有通常由会议主持人致词、讲话等形式和程序。吴忠信在坐床典礼上，除坐位优崇是其作为中央政府专使主持典礼的主要特征外，仅率随员向达赖喇嘛献了哈达，接受了达赖喇嘛以红绶条结成的护身符佩于胸前。

坐床典礼举行之后，吴忠信代表中央政府分别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及其本人的名义，向达赖喇嘛赠送了四扇分别写有“光照震旦”、“诚感诸天”、“泽被众生”、“宏宣佛化”题字的银屏等珍贵礼品。^②

随后，热振摄政于3月7日致电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对中央政府特派吴忠信亲临拉萨主持坐床典礼并向十四达赖喇嘛赠送礼品，表示感谢；次日，噶厦也致电林森和蒋介石，对特派吴忠信亲临主持坐床典礼并赠赐礼品，表示“感戴无际”。^③4月12日，十四世达赖喇嘛致函林森，除对特派吴忠信“驾临拉萨，参加主持达赖转世大典，并颁赐吉祥哈达阿喜一件、玉照一件及珍贵财务多件，实深欣感”外，并祝愿“中藏睦谊，益敦期臻”，同时向林森进呈哈达、金佛像、藏红花、各种皮张、各色氍毹、藏毡等礼物多件。^④同日，热振亦致函林森，一方面对吴忠信代表中央政府主持典礼，认为是“融洽欢腾，诸事圆满，光荣之至”，另方面对颁给他本人封册、金印

① 《报告书》第268页。

② 朱少逸：《拉萨见闻记》。

③ 《选编》第320——321页。

④ 《选编》第338页。

及勋章,表示“铭感五内”,并希望“中藏如常,融泄亲洽”,同时向林森进呈哈达、古佛、照片、皮张、氍毹、藏红花、藏贡香等礼物。^①与此同时,拉萨功德林、大昭寺等寺院僧众,亦向林森、蒋介石致函,对吴忠信亲临主持达赖坐床典礼表示感谢,并认为“如此盛典,历来所未有”,全藏僧俗人民对此“欢声载道”,“无不欣慰,额首相庆”,“从此中藏感情照前恢复,且一切纠纷自必解除无遗矣。”^②

综上所述,吴忠信在坐床典礼上所处的地位,绝非以热振为首的西藏高级僧俗官员可比,亦非包括外国在内的参加祝贺和观礼的使者和来宾所能比拟。吴忠信与达赖喇嘛平行而坐,仅坐垫略低,与清代驻藏大臣照料达赖喇嘛坐床之制相同。吴忠信的座位和面向表明,其身份之崇和地位之高,非同一般,只有代表中央政府的大员和专使主持坐床典礼,才有可能享受这样高的礼遇,参加坐床典礼的观礼贵宾是不可能享遇如此殊荣的。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和史料根据认为,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是由吴忠信会同热振主持举行的。这一历史事实,史籍斑斑可考,无法否认。达赖喇嘛和达赖集团散布什么吴忠信代表中央政府主持坐床典礼是“没有这回事”,仅是“在场观礼”,“只是作为仪式上的贵宾,没有什么特别作用”等,纯属谎言,不能自圆自说。

五、吴忠信的身份、所受礼遇及所做 工作非观礼贵宾可比

除以上所述之外,还可从吴忠信的身份地位、在藏受到的礼遇规格及其所做的工作等方面的事实,进一步看出吴忠信与参加坐床典礼的大小官员和观礼来宾迥然不同。

① 《选编》插图第 11 页。

② 《选编》第 339—341 页。

首先，吴忠信以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国民政府主管边事长官的身份亲自入藏，这“在历史上尚属创举”。

清代，历来是由驻藏大臣代表皇帝和朝廷主持达赖喇嘛转世坐床事宜，从未派遣过清朝中央政府主管边事的理藩院大臣赴藏主持其事。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相当于清代理藩院大臣，职位高于清代驻藏大臣或驻藏办事长官，其亲自入藏主持达赖喇嘛转世坐床事宜，不仅是历史首创，说明国民党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重视，并希望与西藏地方融洽关系的诚意；且充分表明吴忠信同一般参加典礼的僧俗官员和欢礼贵宾，而是如同当年驻藏大臣一样，是地地道道奉命主持十四世达赖喇嘛认定坐床的中央政府代表和专使。

其次，吴忠信抵藏时，受到了隆重欢迎和接待，其礼遇规格是一般祝贺使者和观礼贵宾所无法相比的。

吴忠信进入西藏境内后，沿途受到了西藏地方政府派出官员热情接待，抵达拉萨时，更受到了热烈隆重的欢迎。

当吴忠信行抵噶伦堡时，噶厦得悉吴忠信地位崇高，立即将原定接待费藏银一千两增加至八千两，并督促三乃兴巴加紧筹备欢迎事宜；热振摄政也下令噶厦并转饬全体藏官，“以西藏最隆重的礼节接待吴氏”。^①

吴忠信到达拉萨西郊时，热振下令拉萨全体俗官于西郊接官厅欢迎。其制之尊崇，与迎接驻藏大臣相同。

一月十五日，吴忠信抵达拉萨。这一天，西藏官员“均着最漂亮之服装，鞍马鲜明，仆从如云，驰驱于平整宽广之大道上，十数里内，络绎不绝。”“附近居民前来欢迎者，亦踵相接。妇女多着艳丽之装饰，五颜六色，数十成群，尤点缀风光不少。各界欢迎人员所支帐篷，星罗棋布，不可胜数。”西藏官员在哲蚌寺以东约二三里的接官

① 朱少逸：《拉萨见闻记》。